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四六一期 ——
(二〇〇五年十月十八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510e)

【千秋功罪】倾听历史的声音——千秋评林彪事件	千 秋
【研究动态】中共历史研究的若干热点难点问题 (有关林彪事件)	韩 钢
【几曾回首】关于“重审林案”致金秋女士信	余 言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千秋功罪】

倾听历史的声音——千秋评林彪事件

• 千 秋 •

林彪的是非，中国现代历史的一个重要话题，海内到海外，有很多不同声音，最新的大概就是《重审林彪案件》。当然这也是一个很分歧的话题，从那个大时代走过来的中国人，许多或直接或间接地受过林彪的害，谁能忘得了他的光辉形象呀？

但是，毫不讳言，我是赞成为林彪翻案的，不是想为他鸣什么冤，而是认为，多年来中共领导人自己统治需要，导流群众对30年党祸的愤恨，早已过分丑化了林彪，让他承担了许多不该承担的历史责任。林彪，实际上已被导演成中国传统戏剧中包办一切罪恶错误的大奸臣。历史应该清楚才能有益，至今林彪的棺盖了，论并没有定！一些问题不弄清楚，对人不公平，对历史不负责，粉饰和篡改历史的结果就是后人永远无法吸取必要的教训！这是我的观点。

为林彪翻案不得人心？这口号本身就令人疑惑。政治压倒历史，而且强奸民意，什么叫人心？怎么就不得人心？翻案与人心又有什么必然联系？想过这些问题没有！经历过文革后期的中国人，大都对“翻案不得人心”这一口号不陌生，那是反击邓小平右倾翻案风时用的，曾喊得震天响，有什么用？最终一句笑谈而已！在毛独裁时代，人心就是毛泽东其人之心，他不让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有什么办法，只要老家伙人还在，心不死，你比窦娥还冤也翻不了。而一

旦小平同志上台，核心变了，“人心”也跟着变，全国人民开始大翻特翻文化大革命的案，那真是随心所欲，想怎么翻就怎么翻，“铁证如山”的案子都可以翻。现在叫唤“为林彪翻案不得人心”的人，难道不记得这些历史了吗？

其次，得不得人心，与能不能翻案，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岂能混为一谈？就是汪精卫这样公认的反派人物，今天有人（如林思云网友）不同意历史的结论，写文章要为他翻案，可怕吗？好象没什么可怕的，可恨吗？一点都不可恨！这些文章让我们看到历史上汪精卫的另一面，是好事，不同意也犯不着去反对人家的言论自由。而汪精卫汉奸的本质能不能翻，归根结底要看事实。如果他老人家确实没当过汉奸，你硬说他是汉奸就是冤案，大快人心的冤案还是冤案，还应该翻；反之，再多的人，写再好的文章，都没有用的！有些还恰得其反，台湾的“大才子”李敖就是例子，他写大幅文章，得意洋洋地为自己的汉奸父亲平反。结果呢？说老实的，我就是在看了他这些文章之后，才认定他父亲真当过汉奸。你看：是谁大学一毕业就进入华北汉奸政府任职的？是谁在日本统治时期当上太原禁烟局局长的？李大杂文家的父亲啊！有这样的基本事实自然就会有大汉奸的结论，巧言利舌是没有用的，用家丑破事骂蒋介石徒然自取其辱。所以，我也劝不同意为林彪翻案的人，不管出于什么感情什么需要，不妨多从历史事实的角度去批驳，实在没有必要用口号去压制别人。即使坏人也不应该被诬陷，是吗？

林彪问题的要害，在于中共垄断历史档案资料。他们根据需要，断章取义，随意编辑曲解林彪的言行，认为不好的就放在突出的位置上，好的则略而不提或在动机上做文章。一提到抗美援朝历史，许多国人对林彪的印象就是怯战怕死。有什么根据呢？都来自中共的教科书。一是林彪反对参战，二是林彪称病不接帅印，还在此基础上衍生出种种绘声绘色的故事。而从现在中共披露出来的史实来看，当时中共高层的绝大多数都不主张卷入韩战，本来在这样的重大问题上，决策前支持和反对的意见激烈是非常正常的事，不表态或含糊其词的人才不正常。何况林彪的意见，在今天看来也没错。中共的史书，长期以来，绝口不提其他人反战，而只突出林彪，又将林彪的反战，归结为他怕美国（实际上当年林彪反战的主要理由，同其他人一样，是认为不符中国利益），这就不正常了。按中国人的传统简单思维，不管三七二十一，主战的是民族英雄，不主战则汉奸卖国贼，林彪的形象可想而知了。至于林彪不接帅印，能有什么奇怪的呢？林彪在韩战前韩战后都一直在养病，内战末期他就已病倒，不是中央决定出兵才称病的，建国后他已完全脱离了军队指挥。这样的身心状况，能不能迅速投入一场突如其来而又陌生的大战？林彪于国于己，都要考虑这个问题，中央本就不应该派他出马。当时中共军中不是没人，林彪也不是假病，为什么就不能推辞？同样称病的粟裕，韩战爆发前倒是一直积极准备对台渡海作战的部署，他也不上朝鲜战场，可从没有哪一本史书斗胆质疑过他的病，这公平吗？解放战争中的太原战役，徐向前元帅最后也将部队的指挥权交给彭德怀元帅，也是称病，谁又深究过他的病呢？为什么对林彪，称病就是怯战怕死？是不是为了要证明他的怯战怕死才突出他的反战？

第一次庐山会议，中共史书也着力渲染林彪的作用。林彪的角色当然没什么光彩可言。问题是，当年的庐山会议上，又有几个人是光彩的？要真正了解庐山会议的真面目，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将原始会议记录全部公开，而不是根据结论需要重点引用林彪的讲话。中共高层内部的所谓批评帮助民主生活会，残酷的程度，无耻的程度，有时是外界善良的人们所难以想像的，否则就不会有高岗的自杀和罗瑞卿的跳楼了（这二人当非薄脸皮之人）。人们不禁要问：除了林彪，其他的人模狗样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当年在彭德怀落难时，都揭发批判了些什么？没有比较，或者仅仅用林彪发言中用词较强烈的部分，与其他领导人发言中体贴厚道的部分进行比较，得出的结论自然就是林彪是批彭的主要打手了。这不公平！实际上，林彪在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的批评，并不严厉，更没有什么一锤定音的东西！他是半途上山的，此时彭的命运已经定了，林只是帮助毛使这个会议更体面地下台阶而已，林彪不是阴谋者，也没害过彭德怀，彭自己也应该知道这一点。彭后来的罪名中，比较严重的是路线斗争反党集团里通外国里应外合这几条，

这些不是毛就是刘给他整的，林彪的锤从没有定过这个音（也没这资格），为什么要把罪名都安在林的身上？林彪说彭德怀：“是冯玉祥式的人物，有野心，想当大英雄”，攻击的是个人品质，不是要害的东西，就象彭德怀自己说的“有小资产阶级动摇性”一样，属于思想改造不彻底，革命动机不纯的问题。批判上可以从严，处理上是上不了纲的。况且毛泽东本人也早讲过类似的话。林彪把自己和彭德怀比成丘八，不是治国的料，虽然难听，却也是善意的规劝。庐山会议后，彭林并未结怨，林彪接任国防部长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元帅中彭排第二位，林第三位，以这样的资历，加上与毛的历史渊源，不请他当部长才是非常奇怪的事。如果说林彪批彭有不义之嫌则所有人都这样做了，如果说林彪批彭是抢位子则难以服众。我不明白的是，往往同样的话，同样的事，周恩来做了，那就是出于对领袖的忠心，出于维护党的团结大局。而林彪做了，就一定出于篡党夺权的野心。是不是有点历史唯心主义？

参与文化大革命，搅入混水，是林彪一生最大的争议点，在这场祸及苍生动摇国本的血腥权斗中，林彪和周恩来都是毛泽东整倒刘少奇帮派的最重要帮凶。

但这里，有几点应该加以分辨：

1，文化大革命，源于毛刘的最高权力斗争，独裁专制体制下国无二主，“二日并行”的结果几乎必然就是“火星撞地球”。有没有林彪中国人民都得受这个难！毛刘冲突的起因和整个发展过程与林无关，林彪只是在中央激烈斗争爆发后，才选边跟着毛泽东上了文革的贼船。文革不是因林彪而起，也不会为林彪而止！林彪不知道也决定不了文革的大方向和目的地，这一点他与周恩来处境相似，作用也相似。如果对两者的评价天差地别的话，那就是中共的宣传伎俩了。

2，毛泽东与林彪，是战争年代长期共患难的直接上下级，亲密关系自有其真实的一面！否认这一点是徒劳无益的，从井冈山时代起，林彪就一直紧跟毛泽东。林彪是毛泽东的嫡系部属，林所率领的武装，是毛泽东的嫡系部队。无论历史上毛泽东怎么顺逆起落，林敢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却从未背叛陷害过毛泽东，也没有居功自傲，拥兵自重向毛泽东要过什么价。而历史上的毛泽东，也从未亏待过林彪，这种长期的上下明显而又相互信任的关系在中央最高层中无人能比，不是“投机”“欺骗”所能解释的了的。林在文革权力斗争中跟毛走，同他过往的历史轨迹相一致，我认为也就是一种历史的惯性作用，林彪不能说是被动被迫被骗参加文革，但也绝不是所谓的想利用毛泽东的错误篡党夺权，林彪一开始很可能只是想帮助老上级毛泽东打倒政敌，拔刀相助的成分居多，关键是毛在祸国殃民。把毛林关系说成是互相勾结互相利用的关系是没有道理的，从历史和现实来看，毛泽东处于绝对主导地位，林彪没有怂恿毛泽东去整什么人，也没资格为帮毛泽东打倒什么人而向毛泽东要什么价。所谓“为了打鬼，借道钟馗”的说法不可信！毛总是这样欺世盗名的。就如林彪与贺龙如发生激烈的权力斗争，黄永胜几乎肯定会帮林彪的一样，战争中形成的上下级关系有坚实的感情和利益基础，使军人自然而然保自己的山头，这不需要什么复杂的利益交换，林彪之于毛泽东，也不例外。毛动员林出力，不用费什么劲，倒是如果是刘少奇林彪联手的话，背后肯定有重大的利益交换。

3，由于文革前刘少奇帮派已大致操控党的各级组织，毛泽东想要夺回全党控制权，就得考虑非组织手段。在这种情况下，林彪的军队作为毛倚重的基本力量，不可能不介入斗争。即使林本人能坚决回避，他的部下（特别是四野部队）也一定会以各种方式支持毛泽东，在文革中显示力量。也正因为毛泽东需要武装部队在非常时期起非常作用，这时候的毛是希望林彪在军中畅通无阻的。有毛林关系这种大气候，罗瑞卿与林彪的矛盾就显得很不合时宜，罗的越权和跋扈不是一天两天，对他不满的人也多的很，但没文革就不会有事，林罗矛盾互相牵制有利于党管军队。但文革前夕，在毛泽东倚重林彪的情况下（林在军队的号召力更大，也更可靠），林罗矛盾会不会被刘少奇所利用？谁敢保证！拿掉罗瑞卿是毛泽东必须下的一个政治决心。林

彪敢向毛托出罗瑞卿的问题，也是为毛着想，怕到时候动用军队不便。这是政治斗争的残酷，绝不是什么要胁交换，谁敢要胁毛泽东呀？林是毛几十年的部下，不可能不懂毛的为人！要胁他能有什么好下场？打倒罗瑞卿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一个重要前奏。真正能迫害罗的罪魁祸首只有一个——毛泽东！其他的，包括林彪叶剑英及雷英夫等人，都只是帮凶。罗瑞卿的女儿，至今还不懂这个道理，一头扎进林罗恩怨里出不来！也是典型的不懂政治。罗瑞卿对毛泽东忠不忠？这个问题不重要，不值得强调，这个东西会变的！（至少在毛泽东看来）因时而变，因利而变。关键问题是罗瑞卿处在这么重要的位置上，又不甘寂寞，毛如果用不了你，就得杀你！

4，林彪在文革中，真正势力范围只限于军中，实际上未进入社会，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各项具体措施政策，主要依靠中央文革小组来推行，全国到处煽风点火放火烧荒的就江青那一批人，林彪的作用是以实力作毛泽东后盾。后期的部队支左和军管，也冲击社会，但客观上有稳定局势的作用。林彪同周恩来，对文革权力斗争中造成的大批高干冤案，有较大的责任，中共历史上历次权力斗争都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只管胜负，不管对错，整人整到底，林彪这方面应该是尽力的；但对国家的动荡人民的苦难，因为权力斗争采取群众运动，这方式是毛泽东的缺德专利（毛泽东整人，采用全民参与的运动方式，虽然人民实际上没有任何决定权，但这种参与容易给历史造成错觉，你如只看文革纪录片，那些大场面就很容易让你相信：打倒刘少奇，确是中国人民的选择，毛泽东的胜利确是中国人民的胜利），林周即使不同意也只能跟着哄，而且具体领导文革的中央文革小组已经凌驾一切，林周责任应该较小。林彪周恩来对文革，也就是把它当成一场权力斗争来看待，而刘少奇被斗倒之后，他们也理所当然地以为毛泽东该收拾残局，结束动乱让人民休养生息了，对毛泽东下一步要往哪里去，他们心里也是没有底的。王友琴认为，林彪是文革时期第二号领导人物，当然要对文革的罪恶负起第二大的罪责。她的感情我能理解，但这道理不通，要按这个逻辑，周恩来就要对文革负第三大罪责（我想王也确有这意思），而江青因为排名靠后，反而少罪责。那刘少奇是大跃进时的第二把手，他应该为饿死3千万人负上第二大的罪责！乔石64时期是政治局常委的老二，他对64大屠杀也要负上第二大罪责。这样的逻辑当然不对！要知道，中共政权不是一个股份制企业，其内部权力畸形运作，党内早已不存在集体领导民主决策机制，毛泽东时代更是独裁专制，第一与第二之间实际上是君臣关系，臣的职责权完全由君王随心所欲支配。如果要追究文革中严重动乱和打砸抢犯犯罪行为的责任，首当其冲的应该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如果再细一点分，那文革初期“红八月”等红卫兵暴行，是仍当权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掌握运动主动权，放任高干子弟干的，他们应该跟毛泽东江青一伙平分罪责，甚至还更多！

5，从文革兴起到高潮阶段，军队始终在林彪管理之下，属毛泽东信得过并随时准备充当打手的一支力量，毛泽东希望天下大乱却不敢军队也乱。这就产生了一个奇特的现象，激烈动荡的中国，军队保持着相对的稳定，造反派的野火始终没有全面烧进解放军，军中也始终没有象社会各地一样，形成造反派这样一个特殊利益集团，虽然也有清洗和力量重组，但你方唱罢我登台的都是那些老山头派系，而它们与新生的文革势力之间没有天然的血缘关系，江青张春桥在军中无可借重的代理人，即使林彪倒了，四人帮也无法找到现成人马来填补军队中的真空，这是个致命的弱点。这个罩门产生于林彪时期，当然，他的灾难性后果是体现在毛泽东之后！林彪与周恩来不同的是，比较有效地拒绝了江青把手伸进军队乱搞。就凭这一点，邓小平等享尽后福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也应该吃水不忘挖井人，给林彪一个相对公平的评价！

6，林彪的出逃，惊天动地，是文革从盛转衰的一个重要关节点。不管自愿不自愿，也不论成功失败，林彪在自己生命的最后关头，面临迫害，与逆来顺受的高岗刘少奇彭德怀等人不同，他用行动公开宣布与毛泽东决裂。他背叛了毛泽东，也报复了毛泽东，毛遭此突变进退失据，短时间内不得不大量起用老干部来稳定局势，埋下后来文革翻盘的种子。九一三也使毛泽东神话彻底破产，毛林关系顿成全中国人民的大笑柄，大家明里批判的是林彪，暗地里腹非的实际上是毛泽东，这一点，老毛再糊涂，心里也是有数的，毛泽东再也无法既当婊子又立牌坊

了！应该说，林彪此举对国家人民是有利的。而且，出走很可能真是林彪自己的选择，他没有这个耐性与毛泽东周旋，他也不想象刘少奇彭德怀一样被毛泽东整死在黑房子里，他是喜欢制人而不受制于人的脾气，要掌握自己命运的主动权。林彪不愿苟且，不愿任人摆布，他也不会作贱自己，那就鱼死网破吧！他的选择完全放弃了自己的政治前途，也给家人和帮派亲信带来灾难，但他破了毛泽东的局，打乱其整人步伐，毛林冲突的最终结果是两败俱伤！林彪的结局虽然显得身败名裂，但历史最终会认识他的一些闪光点！对林彪的下场，不同的人自然会有不同的感慨，但我觉得他死得其所，以林总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性情，与其象刘少奇一样被人捆在病床上受辱而死，不如葬身大漠来的干脆利落，至于骨灰盒有没有被供在八宝山上，真正的历史人物，谁在乎这个？“林彪不死，天理难容！”邓小平这话没有水平啊，是人都是要死的，从这个角度看，小平不死，不也是天理难容吗？荣华富贵是一时的，历史的评价才永恒长久！

谈到林彪的垮台，从云之颠到泥之底，速度之快，让人瞠目结舌。有些人认为林彪的结局是必然的，他介入文革就注定不会有好结果，这未免太想当然了。从毛泽东的愿望，当然是“狡兔尽，走狗烹”，但林彪在文革的乱局中绝对不是只死路一条。

可参照的例子就是周恩来，毛后来至死都惦记着周，但给贼惦记的周居然至死也没倒，这其中的奥秘几乎成了中共的一个谜。还有邓小平，两次被毛打倒，两次又爬起来，最后还活泼乱跳地继承了毛泽东的大统，创造中共政坛的又一个神话。平心而论，这两人的实力地位，当时还远不如林彪，他们的成功反衬了林彪的失策。有文章说，周恩来不倒的秘密在于他党政军势力根深蒂固，这大错了！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历史上周从没有过自己的势力，始终没有，更谈不上可以跟他赴汤蹈火的亲信死党了。周恩来之不倒，说白了，是毛泽东在此之前已经扳倒一根又一根的柱子，就剩他了，还硬扳的话，可能会引发大规模的倒塌。建国后，毛整人的周期越来越短，这使他不能及时消化对手的力量基础。毛泽东每整肃一个对手，都会产生树倒猢猻散的效应，这些四散的猢猻（或者叫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不为毛的文革新贵所接纳，也对毛怨恨在心，最后不约而同齐心协力，都聚集在唯一幸存的大树底下寻求庇护。周恩来被动地“招降纳叛”，最后成了各种非主流派和反对派的大本营，盘根错节，势力异常复杂，声势非常壮大，此种情况下，毛泽东才不得不有所顾忌，要小心翼翼地寻找时机和理由。如果换在建国初，毛干掉周恩来，真跟掐死一只臭虫一样！邓小平在中共元老中更不值一提，既不是实力派也不是玉女派，他的所谓“德高望重”“众望所归”，一得益于长寿，别人都死差不多了！二是当权后有立牌坊的特权；三是右倾翻案风中的突出表现。林彪不同，他在军中本来就根深蒂固，后期又蔓延到社会上，尤其在接班人地位确定后，各方势力都吸附或想吸附在他这棵大树上，许多人与林彪并没有很深渊源，也不是崇拜林彪，但在文革的乱世下，总找个保护伞，与其找江青张春桥，不如找林彪，起码林属老革命家，声名显赫，跟他不丢脸。许多老干部特别是军队的，这种心理非常浓厚。许世友在第二次庐山会议，毛泽东已明确表态的情况下，仍写联名信支持林彪，固然是厌恶张春桥，但实质是盲目相信林彪的后劲，还认为这绩优股值得长期投资！

周恩来处理与毛泽东的君臣关系，现在我们都知道了，有句名言：“只可顺守，不可逆取”。本来，顺守与逆取，只是混迹官场立身处事方法的不同，本身没有高低对错之分，古今中外，顺守逆取都有成功和失败的例子，成效完全视乎个人的巧妙运用。在这里，知己知彼和审时度势是非常重要的，周恩来之所以坚持顺守并最终成功，一基于他个人所拥有的厚黑素质，那完全是达到了一种唾面自干百毒不侵的境界！二意识到毛泽东已时日无多，许多难题毛一死都会迎刃而解。周恩来甚至不顾禁忌，擅自将毛泽东的病情转告林彪，其要转达的意思非常明显，毛泽东，秋后的蚂蚱，蹦不了几天啦！熬过这一阵，可能就是你的天下了，现在争议的东西到时候想怎么解决就怎么解决！应该说，顺守，在那种特定情况下，是上策。可惜，无论林彪还是右倾翻案风时的邓小平，都没有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

毛泽东如果在刘少奇刚刚斗倒之后，林彪还无明显大错的情况下，马上硬拔林彪势力，震动应是非常大的，非伤筋断骨不可，也使刘少奇的残余势力逃脱打击。而且如果基本不动军队，林彪的巨大潜势力就难除根。林彪即使下台被软禁，只要不死，等毛泽东一有三长两短，政治上很容易东山再起。汪东兴之流，甚至就会主动靠上林彪，为其粉碎四人帮。

毛泽东如果想彻底清洗林彪势力，势必大动军队，其中的阻力离心和反弹自不必说，就算一切顺利，亲林彪的军队就是毛自己的嫡系部队，毛这样做无异于自废武功。九一三之后，林彪势力群龙无首，军队被大清洗，被整的都是共军的主力部队，这样做的结果有二：1，解放军的战斗力明显下降了一个台阶；2，解放军对毛泽东的效忠程度呈几何级数下降。林彪事件后，毛泽东惶惶不可终日就与失去对军队的信任有关，此后毛基本上只能靠象明末东厂锦衣卫那样的特务手段控制全国，这支力量就掌握在汪东兴的手上。在探究毛临终的权力部署时，会发现两大有趣现象：1，毛寄望于毛远新却又不把他放在北京军区以就近控制大局；2，毛不放心汪东兴却又没换掉他。这也都事出有因，毛远新没有军界背景，短期内在北京军区难有大作为；汪东兴不是不想换，而是不敢，在外部局势仍未安定，军队又不可恃，特务系统如再进行清洗，无异于将自己的空挡露给对手。而且毛泽东已奄奄一息的情况下，汪东兴狗急跳墙，会不会联合外部势力，也来个571工程纪要？毛失去可靠军队支持后，在权力斗争中的选择余地实际上也很有限！

林彪坚持韬光养晦，以静制动是当时对付毛泽东的最好方法。毛泽东一时也不能把他怎么样。太子难当，但封建社会换太子也不是可以朝三暮四的事，时间拖的越长，毛泽东的病就越重，林彪的地位也越稳。但这样的策略要求林彪能经得起毛泽东及其同伙的侮辱和挑衅。顺守如果不喜欢，逆取也不是就不可，问题是这么大的事，需要早准备，早下决心和全力动员，才有成功的希望。有人说，反对毛主席，在那个年代没人敢参与，谁说的呀？中国哪朝哪代都不缺敢做杀头生意的人！何况有这么大的利益诱惑。林彪的悲剧在于他既不顺守也不逆取，特别是庐山会议后，非常消极，可以说是无所作为，一无所是最后还闹出了个自我爆炸，害惨了那些支持他同情他帮助他的人们。

如果说我对林彪还有一些同情的话，就源于此，他哪象是一个野心家阴谋家啊？庐山会议后，基本上独坐家中消极抵抗，唯一主动的就是想找毛泽东谈心消除误解。而毛泽东呢？又掺砂子又摔石头又挖墙角，多有干劲啊！对林彪有意见当面不提，专程南下串联，背后嘀咕说尽林彪坏话。堂堂的主席，玩这种把戏，让人齿冷。这里面，谁光明正大，谁在搞阴谋诡计？谁要团结谁要分裂？还不明白吗？

林彪同彭德怀一样，都是一员虎将，战争年代多年的行伍经历可能会养成一些唯我独尊的气质。彭德怀个性张扬，显得暴烈，林彪因为内向，这种气质就表现为自尊心极强。第一次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对毛泽东说：“当年你操我20多天娘，今天我操一天娘都不行？”近乎骂街，是受辱后情绪失控的一种表现。而第二次庐山会议后，倔强的林彪不顾一切后果地对抗毛的批评，死不认错，也是这种丘八脾气的大发作。说到底，他们两个本质上都是丘八的料，当不了政治家的！但林彪和彭德怀还有所不同，彭是粗中有细，而林是细中有粗。彭德怀在庐山会议的最后，还是向毛泽东低头认错，而且还保证自己不会自杀。这后一点我们可以看到，老谋深算，在后来的政治斗争中经常被其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用到，这些人在被带走之前，往往向组织和家人保证自己不会自杀，意即如果我死了，那一定是被人害的！这大概也是高岗事件的一个后遗症。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的残酷性和戏剧性由此也可可见一斑！（自杀本是个人行为，自己不想自杀就不会自杀，何须向别人保证？古今中外，只有共产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才干这事，其中的诀窍就是为自己的将来保留人证。你看看，生死关头，他们的心眼还能这么精细，国民党的大佬，哪斗得过！）说到林彪，一向思维谨密，从揭出来的材料看，对毛泽东的为人还是有先见之明的，对怎么与之相处，理论上也很有办法的，什么“主席画圈我画圈”，“宁

可君先臣后，不可臣先君后”，一套一套的，开头也做的不错，在陶铸遭难前，林彪还提醒过，希望他退保。可是世界上的事情往往知易行难，庐山会议上毛泽东翻脸不认人时，林彪一怒之下就全乱套了。实际上当时争论的那些事情，设不设国家主席，是不是天才，P大的事，可笑的事！即使被毛泽东冤枉了，被毛泽东陷害了，又怎么样？能怎么样？政治上这种东西家常便饭，毛泽东就是搞这个起家的。你林彪也不是没见过世面的人，几十年跟着毛泽东，这样的事本身就没少干！文革初期对刘少奇对彭真也是这么干的！怎么会莫名惊诧呢？林彪不是不明白，实在是想不开啊！林彪这时候最需要的是冷静，而素以冷静著称的林彪就是没办法冷静面对毛泽东已过河拆桥的现实。他的个性，决定了他的失败，在政治战场上，林彪比彭德怀更不经打，下场也更惨，几乎是一触即溃全军覆没！

“林彪事件不是案，那是一段历史。”我欣赏吴金秋的这句话。从不同的角度看，林彪事件是一个案件，也是一种政治，但最终他还是历史。而从不同的需要出发，对林彪的平反，也存在三种不同的层次。

首先，对林彪家人及一大批受林案牵连的人来说，这确实是压在他们头上的一个反革命集团案。凡中国人都知道这罪名的份量，我们都是过来人。几十年来他们已深受其害，他们希望解脱，他们要求重审，这是每个人都可以理解的，我们不一定同情他们，但我们也没权压制他们。就林彪罪案本身来说，其核心是谋反，即林彪是否涉及谋杀毛泽东是问题的关键。在封建社会里，谋反（当然是不成功的谋反了）是最大逆不道的罪过，如坐实这个罪名，任一当权者都不敢随意为林彪翻案，而如推翻这个罪名，所谓毛泽东粉碎林彪反革命政变阴谋也就子虚乌有了。这方面定案的证据非常薄弱，如林彪确有政变阴谋，以毛泽东的特务手段，不会拿不到什么罪证的。想平反林彪，林家后人就应集中力量质疑这个问题，反驳有关证据，而不是一直纠缠在林彪出逃是否自愿的问题上。林豆豆的所作所为，恕我直言，太没见识！

第二，对党来讲，林彪事件是政治。他成也政治，败也政治，今天党愿不愿意给他平反，还是政治。林彪冤不冤，党中央最清楚，毛之后的中共高层中，没什么人与林彪特别过不去，大家都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即使是林彪刺毛了，那也是做了许多人想做而不敢做的事！但不要为他平反，什么时候平反及平反到什么地步，要看对当权者是否有利。因为这问题涉及文革的历史，毛泽东的责任，会影响人民对党的信任！随着文革的远去，平反林彪给社会带来的冲击越来越少，林彪在部队的人马早就销声匿迹了，但四野部队还在，部队对老师的尊重还一定程度存在。在二野三野出尽风头之后，新的领导人为安抚原四野部队，争取相关军队支持，重新评价林彪的功过也不是不可能的。但这种政治上的平反只能是个姿态，甚至可能是闹剧！林彪如果也象其他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样，重塑金身，拥入圣堂，与毛泽东刘少奇等生前仇敌喜气洋洋地欢聚一堂，又有什么真正的意义？

第三，对人民来讲，林彪案件是历史，人民需要了解其中的真相。许多中国人对林彪是有成见的，特别是对林彪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这不奇怪，林彪的腾飞伴随着文革的兴起，林彪的垮台结束了文革的高潮。林彪横死后，毛泽东威望动摇，大批的老干部被解放，下放干部被召回，人们对此是大快人心的，也自然而然地把自己所受过的苦难都归咎于林秃子。要想在人民中真正平反林彪，就需要重述这段历史，讲清楚林彪在其中所处的地位，所起的作用，这需要更多的史实，更多的内幕。中国人民，由于长期被封锁资讯，灌输观点，存有逆反心态，实际上非常欢迎各种翻案文章的出现，他们可通过不同的说法来探求一个真实的历史。何乐而不为呢？而林彪如果地下有知，他所真正希望的，我想也应该是这种面向人民的平反。

~~~~~

【研究动态】

## 中共历史研究的若干热点难点问题（有关林彪事件）

• 韩 钢 •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共历史的研究大大地拓展了，很多问题的研究比过去要深入得多。一是第二个历史决议对一些重大历史问题重新作出结论，一些长期被定论的历史问题在高层领导人及相关机构和专业研究人员共同努力下重新得到评价；二是中共历史的研究出现民间化趋势，从主流意识形态剥离出一个民间研究的学派，产生了许多新的研究成果。

### ◇ 中共九大报告起草之争问题

近些年来，关于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争论，逐渐为研究者注意，因为这牵涉到林、毛的关系。有人甚至认为，这是林同毛在政治上分歧的开始。

事情大致经过是：毛最初要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起草九大报告，林挂帅。陈甩开了张、姚，单枪匹马自己干。后来，陈没有按照毛要求的时间交稿，毛一怒之下，要康生、张、姚另外起草，但是也没有叫陈停下来。用毛的话说，“两家各搞各”。结果，张、姚同陈发生冲突，张、姚指责陈稿是鼓吹“唯生产力论”，陈则认为张、姚稿是“伯恩斯坦的”，“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毛肯定了张、姚稿（毛自己也做了不少修改），否定了陈稿。而林则从一开始直到上九大主席台作报告，看都未看一遍张、姚稿。

有研究者指出，两个九大报告稿子的起草以及毛、林的不同态度，反映出毛、林对于“文革”运动的不同想法。在林看来，“文革”运动过去之后，还是要讲国家的经济建设，要搞国富民强，主张九大报告可以从人民、国家的角度去讲。陈伯达是根据林的这个想法去写报告的，所以拟定的题目是《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据陈当时的两位秘书回忆，陈曾经对他们谈过起草报告的主题设想：运动不能再搞了，现在的主要任务应该是抓生产了。陈还嘱咐秘书帮助他搜集这方面的资料，要各方面有关经济建设、生产方面搞得好的典型资料。毛对陈交出的稿子很不满意，认为没有把文化大革命的作用突出出来，对经济方面讲得太多，本末倒置，在政治上的分量不够。这种判断，从中共十大报告对林彪、陈伯达的批判可以得到某种反证。中共十大报告说，九大以前，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了一个政治报告，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林、陈的报告被中央否定了，而对毛主持起草的报告，林暗地支持陈公开反对，被挫败后才勉强接受了中央的政治路线。十大报告透露出三个信息：首先，九大有两个报告稿子，一个是林、陈稿，一个是毛稿（实际上是张、姚稿）；其次，林、陈稿主张九大以后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第三，林支持陈反对毛稿，结果林、陈稿最终被否定。

对于上述事实以及判断，当事人或知情者的说法并不完全一致。

首先，林彪的想法到底是什么，尚无公开的文献能够证明。最具体的口述材料，是林当时的秘书张云生的回忆。张回忆，林接受毛要他挂帅搞九大报告的任务后，一方面要陈、张、姚起草准备正式发表的稿子，另一方面找秘书们准备一个口头讲话（林的说法叫“拉条子”）。林说他这次口头讲话，还是用八届十二中全会讲的六个题目（文化大革命的意义；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斗争；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的发展；中国革命在世界上的作用；今后怎么做）。据张回忆，后来林在全会上的讲话，把秘书们按照他的想法准备的“条子”上的大部分内容都用上了。从这个情况，人们还很难看出林关于九大的讲话一定是讲发展生产。

其次，陈伯达起草报告是否与林交换过意见，有两种说法。吴法宪说，陈伯达写报告时天



天跑到林家，商量怎么写，林讲了个大概。毛否定陈的稿子后，林很不高兴，因为陈稿是林、陈商量的。林的秘书回忆，林在最初曾经将陈、张、姚找到家里，谈话不到一小时，他们三人出来后，张、姚对陈说由他动手，需要他们可随时找。后来陈找没找过林，张云生没有提及。陈的两位秘书也谈到林约陈、张、姚商谈一事，而且透露林这次还表示委托他们三人代劳，报告内容由陈考虑，他自己就不多过问了。此后，陈还带着提纲找林商量过一次。至于陈花近一个月时间起草的稿子，则没有一个领导人看过。陈的儿子陈晓农编纂的《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依据陈的两位秘书回忆，并援引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的材料（毛在中央会议上质问陈伯达：“你究竟什么人在搞（指写九大报告——笔者注）？”陈答：“我自己一个人在搞。”），断然否定了吴法宪的说法。因此，陈是否根据林的意图起草报告，也还存疑。

第三，周恩来是否支持陈起草的稿子。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一书中，提供了一个过去不为人知的情况：林认为，“文革”运动过去之后，今后还是要讲国家的经济建设，要搞国富民强，主张九大报告可以从人民、国家的角度去讲。陈伯达为此曾经私下征求周恩来的意见，周表示支持。这样一来，林更加受到鼓舞，因为他知道抓经济工作还要靠周。但是，陈晓农编纂的《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同样依据陈的两位秘书的说法（即陈稿在交毛之前“没有一个领导人看过”），认为高的说法没有根据。

一些研究者认为，中共九大报告起草的争论，尽管史实还有待进一步澄清，但是多少已经折射出林同毛的不和。吴法宪回忆，九大报告由张春桥等人“另起炉灶”后，林说过：写什么就是什么，我林彪一字不改。九大报告，是林在会上照着稿子念的。张云生回忆，张、姚的三次稿子送给林，林一次也不看，一字也未改，顶多只让秘书讲讲毛对稿子修改的地方。有的研究者认为，林的不满显然不只是对张、姚，还包括对毛。这是后来毛林关系恶化的一个重要征兆。

#### ◇ “第一号号令”问题

关于“第一号号令”，“九一三事件”后，在中共中央下发的有关《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上是这样说的：“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八日，林彪乘毛主席不在北京，擅自发布所谓‘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调动全军进入战备状态，这样的大事，竟不请示毛主席、党中央，实际上是一次篡党夺权的预演。”

事情的经过是，一九六九年，中苏军队在黑龙江珍宝岛地区接连发生武装冲突，此后中苏边界局势日趋紧张。毛泽东提出“要准备打仗”。九月，中苏两国政府首脑商定于十月二十日在北京举行边界问题谈判。中共中央根据当时苏联方面的动向和一些情报，怀疑苏方将以谈判为烟幕，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因此决定在此前将在京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人疏散到外地。周恩来留守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黄永胜指示负责作战的副总参谋长阎仲川组织一个前方指挥班子，进入指定位置。黄则带领军委办事组的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刘贤权、温玉成等随同进驻。十月十五日，毛泽东离京去武汉。十七日，林彪去苏州。十八日，林彪做出几条指示，大意是：苏联谈判代表团将于十月二十日来北京，对此应提高警惕。为了防止苏联利用谈判作烟幕，对我进行突然袭击，全军各部队要立即疏散，各种重要装备、设备及目标要进行伪装和隐蔽，通讯联络要保持畅通，国防工业要抓紧武器、弹药的生产，二炮部队也要做好发射准备等等。接着，由林彪秘书向在北京的总参谋长黄永胜作了传达。黄永胜向阎仲川传达林的指示。当天晚上，将“第一号号令”依次下达各大军区和海军、空军、北京卫戍区。

近些年，有关“第一号号令”，当事人和研究者都还有不同说法和看法，争论最大的仍在事实方面。争论的焦点在于，“第一号号令”事先是否报告了毛泽东。

当时随同毛泽东在武汉的汪东兴回忆，林采用电话记录的方式，于十月十九日用急件传阅给毛泽东，先交周恩来，由周转毛阅。汪将传阅件送毛，毛一脸不高兴的样子，说“烧掉”，自己拿起火柴点着了传阅件。当天晚上，周恩来打电话给汪，问毛看过紧急电话通知没有，汪告毛已经烧掉，周惊诧未语。

林的秘书张云生则另有说法。张回忆，到苏州的第二天下午，林向张口述了六条指示（即上述介绍的内容）。张做了记录。当时，林让张赶快用电话传达给黄永胜。张问林是不是压一下再发出，林同意并让张给叶群（“林办”主任）看看。据张说，他向叶群提了两条建议，第一，像这样的重大问题，最好请示一下毛主席；第二，第六条讲二炮要做好准备，二炮是管按电钮的，一旦不慎，一次发射可能引起世界大战，因此对这一条应该加上一些限制词。两条建议叶都同意，而且向林彪作了报告。林同意，并说照叶说的办。叶向张云生布置，向毛报告由她负责，传给黄永胜由张负责。晚上七点钟，张将林口述的六点指示电话传给了黄。按张的说法，林是同意报告毛的，而且由叶报告。

据一个材料介绍，在北京的阎仲川是当晚八点钟左右接到黄的秘书电话，赶到黄处，听了黄的传达的。黄传达时讲得不够连贯、缺乏条理，有些地方黄还作些解释和补充。传达之后，阎仲川问黄如何向下传达，黄说用电话跟他们说说就行了。阎仲川考虑到必须确保首长指示传达准确无误，就要参谋按照他的口授，整理出一份电话传达稿，又加了个编号，吩咐下面把它作为“前指”开设以后的第一份首长指示，就从一号编起，叫“一号号令”。阎仲川要参谋将稿子送呈黄，但黄的秘书说黄已经服用安眠药睡下。阎仲川考虑距苏联代表团入境只剩十几个小时，所以一刻也不能耽误，便决定传给有关单位。时间是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八日二十一时半。阎同时指示值班人员上报“林办”，时间是二十一时四十四分。

上述不同说法，引起研究者注意。有人对汪东兴的说法提出疑问：当时的中共中央文件称林彪是以电话直接向毛报告的，汪的回忆却成了经周转报；毛、林、周各在武汉、苏州、北京，如果林先打电话给周，周再形成“传阅件”，很难当天送到远在一千多公里之外的毛，况且，没有任何一份官方文件说过林给周打电话的事情。若毛真的“烧掉”林的电话记录稿，他并没有说明烧掉的原因，为什么就认定是毛对林的“一号号令”不满？即使真如汪所说，当时在场的只有汪，那么将此事告诉林（还有黄等人）的也只有汪，而毛对此事并无指示。叶群十月二十日在京西宾馆已经讲到此事，很可能是十九日得知的。那么，汪为什么如此急切地将这个引起林等人恐慌的消息泄露出去？汪是对谁讲的？怎么讲的？汪回忆称，林、黄等人知道毛的态度后，赶紧下令撤消了“一号号令”。此事纯属于虚乌有。“一号号令”发出以后，全军各部队一直在认真执行，各大军区、各军兵种不断有报告给中央军委，直到一九七〇年四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部队疏散的指示》，这一行动才告结束。既然毛反感此事，为什么这么长时间听之任之，始终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有研究者注意到，当年参与审理“林彪集团案件”的军事检察院副检察长图们与作家肖思科合著的《超级审判》一书，谈到一个情况：“两案”的决策者原曾想把“一号号令”问题作为林彪罪状写进起诉书，但感到证据不足。于是，调集十四名军队干部查阅档案，寻找证据。查寻结果，该书未做交代，但是却说到，决策者们一致认为包括“一号号令”在内的几个问题“定罪理由不充分”，因此决定“不列入起诉书内容”。后来，参与查阅档案者有人甚至曾向阎仲川透露，查到了林彪向毛报告的记载。

关于此事，八十年代中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增订版有一个引人注目的修改。这本书一九八一年版本的叙述是：“同日（即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引者注），林彪借口‘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擅自发布‘紧急指示’，调动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被毛泽东发现后制止。”修订后的叙述是：“同日，根据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有可能

突然恶化的估计，林彪做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抓紧武器的生产，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十八日，黄永胜等以‘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正式下达这个‘紧急指示’，引起了各方面的极大震动。”修订后的叙述同原来版本有明显区别，首先交代了这个号令的由来，同时交代了号令的基本内容和下达的程序，特别是删去了原来“借口”、“擅自”等带价值判断色彩的说法，而做了一种中性的事实陈述。

二〇〇三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也肯定“第一个号令”是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国际形势的估计、针对苏军有可能入侵的估计做出的。毛传也没有用“借口”、“擅自”的说法，但是却强调林彪此举事先没有得到毛的批准，“自行”做出指示。毛传的根据，就是汪东兴的回忆。

顺便介绍一下，“文革”结束后，“一号号令”还被作为“迫害老一辈革命家和高级领导干部”的一个阴谋。许多出版物和文章都把当年党政军高级领导人和老干部疏散外地，受到迫害，同这个号令联系起来。八十年代末，有研究者根据史料澄清了事实：疏散中央领导人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决策，周恩来主持安排并经中央讨论决定的。至于广大知识分子、干部和文教单位下放，是根据毛泽东关于“认真搞好斗、批、改”的指示进行的，在“一号号令”之前，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就先后发出过相关文件或指示；况且“一号号令”只限于军队，根本谈不上是干部下放的“最后通牒”。

#### ◇ 设国家主席和中共九届二中全会问题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设国家主席被认定为林彪集团的“反党政治纲领”。按照当时中共中央文件的说法，林彪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急于当国家主席，抢班夺权。八十年代以来，在林彪事件的研究中，对这一问题存在很大争议。这些争议既牵涉价值判断，更牵涉事实判断。

有专家认为，设国家主席是中共执政以来的定制。一九五四年当代中国第一部宪法，即规定设置国家主席。毛泽东被选为第一届国家主席，一九五九年开始刘少奇连任两届国家主席。“文革”中刘被打倒后，某些需要国家主席的场合由董必武以“代主席”身份出面。中共九大后，召开四届全国人大提上日程。选举新一届国家主席，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毛提出不设国家主席，则是不合情理的。

更大的争议还在当年设国家主席一事的史实方面。九十年代以来，随着一些文献档案的公布和著述的发表或出版，人们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从提出到终止大约经过了半年时间，其间曲折反复，直至九届二中全会酿成风波。有关史实的争议和疑问在于：

#### 第一，设国家主席是不是林彪一个人的意见？

一九七〇年三月初，在武汉的毛泽东收到周恩来的信和宪法修改草案提要。周信谈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宪法中原有国家主席一节，是不是还写上。这个情况，是汪东兴在新版回忆录（即《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提供的。不管作哪种理解，有一点是肯定的，即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一开始就是“政治局常委”提出的。三月七日，毛提出不设国家主席，并要汪回北京传达他的意见。第二天，汪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传达。到会的中央政治局成员一致拥护毛的意见。林在苏州，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周委托参加会议的叶群转告政治局会议的情况。三月九日，林彪让叶群转告在京的黄永胜、吴法宪：“林副主席赞成设国家主席。”三月十六日，政治局通过《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报告》等文件，报送毛泽东，毛在批示中再次表示不设。三月十七日至二十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大多数与会者同意毛

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既然是“大多数”，说明还有少数人并不是这种意见。会议期间，林彪让秘书给毛的秘书打电话：“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毛让秘书回话：“问候林彪同志好！”回话没有明确表示否定林的建议。四月十一日，林在苏州通过秘书向政治局转达三条意见：一、林仍然建议毛主席兼任国家主席；二、关于副主席，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三、林认为自己不宜担任国家副主席职务。第二天，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林的意见。会上，多数政治局成员同意由毛担任国家主席。到这时，设国家主席一事经历了第一次反复。

有研究者认为，按中共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毛应该服从多数的意见。但是毛否定了集体意见。会后，周将这次会议情况报告毛，毛当天批示：“我不能再做此事，此议不妥。”《周恩来传》说这是“文革”以来毛与林第一次在重大问题上各执己见。其实，这不是毛与林一人各执己见，而是毛与政治局多数成员（既有周恩来，也有江青集团的一些成员在内）意见相左。四月下旬，毛和林差不多同时回京。毛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第三次提出他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要设国家主席，并当着林的面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火炉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七月中旬，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会议，会上再次出现要求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毛听说后表示：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周提出：可以考虑不设国家主席、副主席。这是此事的第二次反复：毛的意见占了上风。

当年八月下旬，在庐山召开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二十二日下午，毛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会期和日程。几名常委表示，根据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应该实现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个国家元首、国家主席。毛听了不满意，说：设国家主席，那是个形式。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国家主席。如果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主席。康生在这天全会开幕会上讲话中说，在群众讨论中，在要毛当国家主席、林当国家副主席的问题上，“所有意见都是一致的”；“如果是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那么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康在这天还说过：“因为这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希望，我们起草也这么希望，但又不敢违反主席的意见。所以，一直处在这样一种矛盾当中。”这是此事的第三次反复。

有研究者认为，从上述史实看，设国家主席和要毛担任国家主席的建议，既不是林彪一个人提出来的，也不是林一个人始终坚持的，而是当时中共全党的意愿，是中央政治局大多数成员的意见。

## 第二，林彪是不是想当国家主席？

这个说法出自毛泽东。一九七一年毛南巡讲话说：“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西天了，他们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有研究者认为，对这一说法可以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是林想当国家主席算不算个问题？二是说他想当国家主席有没有根据？

林的法定“接班人”地位，是毛亲自挑选并亲自“大树特树”起来的。这样的“接班人”、副统帅，想当一个按毛的说法是个“形式”的国家主席，又有什么了不得？说是为了“篡党夺权”、“抢班夺权”，既不合逻辑，又不合中国国情和历史事实。毛早在十多年前已经让出国家主席位置，自“文革”以后这个位置更无实际权力。而且，“党是领导一切的”，要篡权，应该是篡夺党的领袖的位置才对。这是中国普通老百姓都明白的常识。

那么，说林想当国家主席有根据吗？有研究者认为，迄今为止，谈及这个问题的文字只举出了吴法宪在“九一三事件”后的一个交代。吴说，叶群对他说：“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这个材料只能算是孤证。其一，叶群的讲话不一定能够代表林彪的意见。其二，

吴法宪“交代”的叶群这句话是否真实？至少它不是叶群的原话。其三，如果林有此意，会跟几员心腹大将都打招呼，绝不会只跟吴法宪一个人讲。但是，其他人却没有这个交代。其四，在“无法无天”的年代按照最高领袖的意旨突击审讯，这样交代出来的结果是否可信？其五，即使这个交代是真实的，也是在“九一三事件”以后，而庐山会议（即九届二中全会）前后毛不可能知道，自然也就不可能据此判断林想当国家主席。

第三，九届二中全会是因为设国家主席一事而起风波的吗？

已经公开的文献和各种口述材料表明不是。八月二十二日，九届二中全会开幕的晚上，陈伯达同吴法宪商量，整理出一份恩格斯、列宁，毛泽东以及林彪论述“天才”的语录材料，第二天分送给了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二十四日，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分别在华北、西南、中南、西北组同时发言，宣讲“天才”语录，并且提出有人反对毛主席。其中以华北组最为激烈。陈伯达在该组发言说，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二十五日，反映华北组讨论情况的第六号简报发到各组，各组的发言都集中到要“查明”、“揪出”反对毛主席的坏人的问题上。从徐景贤的回忆录看，连华东组的“火药味”也越来越浓，有人甚至领头呼口号：“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打倒野心家！打倒阴谋家！”张春桥尽管强装镇静，脸色却非常难看。会议气氛紧张起来。

这件事情有前因。此前在陈伯达、吴法宪与张春桥之间发生过两场“文字”之争。七月二十七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准备发表的纪念建军节社论稿时，陈伯达主张将“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句，删去“毛主席和”几个字。张春桥坚持不改。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向毛请示，毛表示，这类应景文章，既然已经政治局讨论，他就不看了；至于提法问题，这无关紧要。据汪东兴回忆，毛当时还表示，两种意见，他都不赞成。缔造者不能指挥，能行吗？缔造者也不光是我，还有许多人。后来，汪还是按毛的意见删去了“毛主席和”几个字。八月十三日，中央修改宪法工作小组开会，讨论宪法草案稿。吴法宪与张春桥就宪法草案稿的一些提法发生争论。张以毛在一次会见外宾时谈到“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马列主义是讽刺”为依据，提议删去稿子中“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和“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等提法。吴法宪反驳说：“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会后，吴法宪将情况告诉了陈伯达。九届二中全会上，陈、吴等人旧事重提，向张春桥等发难。

有研究者认为，毛并不是因为设国家主席一事而发怒的，而是因为看到江青集团受到了攻击。所以，毛说反张春桥就是实际上反对他。但是从汪东兴的回忆看，毛在事情起来之后却多次点到设国家主席问题。看来，关于此事仍存争议。

#### ◇ “九一三事件”问题

迄今为止，关于“九一三事件”的研究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广义上的研究，即把毛泽东与林彪的关系作为问题的核心，由此来梳理线索和脉络。这种研究大多是从“文革”的源头开始追溯，有的甚至追溯得更早。还有一种是狭义上的研究，即围绕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发生的林彪座机出逃和坠毁的事件来考订和分析。这里介绍的是后一种研究的情况。

“文革”历史的研究，最为复杂、最多争议也最为困难的问题，就是“九一三事件”了。有关“九一三事件”的文献档案披露极少。尽管如此，研究者还是根据有限的史料做了不少研究。除了国内公开出版的专业人员的著述外，海外相关著述也很多，去年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的《重审林彪罪案》一书，搜罗境内外研究者的文章，是近年来关于“九一三事件”的研究最为集中的一部学术著作，引起研究者注意。

研究者所据的史料，除了有限公布的文献外，大体还有三类非原始文献的材料：一类是审理“林彪集团案件”时的供词和证词；二类是相关当事人的口述回忆，这里说的相关当事人身份各不相同，有前中共高层官员如汪东兴、吴德、李德生，有毛、林、周身边工作人员如李志绥、李文普、张云生、官伟勋、高振普，有中央警卫部队和空军的干部如张耀祠、陈长江、康庭梓、时念堂，有林彪家人如林立衡、张宁，有中国外交官员符浩、许文益，还有“两案”审理人员（算是间接当事人）如图们、高德明，作为当事人，他们的口述回忆有价值，但又有程度不同的局限性，而且相互抵牾，使用时须格外慎重；三类是有关机构编写的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传记、年谱，其中也有一些相关材料的片段。还有一类，是一些非历史专业人员写作的文章或图书，有的称纪实，有的干脆叫文学，不能作为史料看待，但是有的也夹杂一些对当事人的采访，只是更需要进行仔细考辨。这里仅举几例，简单介绍当事人和研究者对史实争议和疑问的部分观点。

### 第一，林彪是不是自愿出逃苏联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关于“九一三事件”最具爆炸性的说法，就是当年林彪出逃并不是自愿而是被林立果及叶群等人挟持的。这个说法最早出自林彪的女儿林立衡，林立果的未婚妻张宁在自述中也支持林立衡的说法。判定林彪要出逃苏联的重要证据，是林的卫士长李文普当年的交代，即李在汽车上听到林彪问林立果“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张宁举出一条相反的材料，说当天晚上一位内勤曾听林彪说过“我至死是民族主义者”。张还暗示李文普有某种特殊背景，所以在林立衡多次提醒李阻止林立果等人挟持林彪后，李没有采取措施；并说李被枪击中是自伤。有研究者赞同此说，至少对林彪自己要叛逃的说法表示质疑。林彪开始是要飞往广州，因燃油不够才飞向蒙古，此事应由林立果负责。李文普则发表文章，反驳林立衡、张宁，坚持当年他在受审查期间交代的说法。也有“两案”审理人员发表文章，反驳林、张。

### 第二，林彪出逃前，毛泽东、周恩来是如何应对的？

这件事的当事人说法不一，研究者也有很大分歧。关于毛泽东，一种说法是毛通过各种线索（有人暗示包括特殊途径）对林的活动不是不了解，但是除了密切注视林的动向外，毛并不采取积极主动的措施，其目的就是让林彪自己现出原形。相反的一种说法是毛对林的动向所知有限，并不十分清楚；还有的当事人说毛根本不清楚林的动向，只是林的座机起飞后毛才知道。关于周恩来，最早得知北戴河情况的是周，一种说法周虽然多少知道一些北戴河的情况，但是一时难以作出判断（因为周了解林家内部的矛盾，他无法确认是林立衡同叶群又发生了冲突，还是真如林立衡所说林彪要被“挟持”），所以颇费踌躇。还有一种看法，认为周并不是不想采取措施，但他很快了解并且只能贯彻毛的意图，因此周是根据毛的想法来处理事情的。比如周曾经打算直飞北戴河见林彪，同林面谈。有人介绍，据汪东兴说，事后周的确曾告诉他，当时打算去北戴河，并且已经让杨德中（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副处长兼中央警卫团政委）准备飞机了。为什么后来没有去？有人说是毛没有批准，但是此说没有有力证明。不过，有研究者推论，在这样敏感的问题上，行事谨慎的周事先一定会向毛报告的。

### 第三，林彪座机是怎么坠毁的？

九十年代以来，在林彪座机坠毁问题的相关研究中，有三篇文章引起研究者普遍注意，一篇是澳大利亚记者彼得·汉纳姆写的《揭开林彪死亡之谜》。一九九三年，汉纳姆在《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的资助下，先后访问蒙古、苏联、中国、美国 and 台湾、香港等六个国家和地区，采访了众多人士，写出了这篇调查报告。一篇是当年未登机的“256号”飞机机组成员康庭

梓写的《林彪座机强行起飞之后》(此前康在一九九九年发表了《林彪座机强行起飞之前》一文)。还有一篇也是康庭梓写的,《林彪坠机过程的思考》。三篇文章提供了三幅林彪座机航线图,不同的是,前一篇是“256号”飞机航迹全程图,后两篇除了航迹全程图外,还有起飞后十四分钟内的航迹图。前一图引人关注的是,飞机航线的最北端不是温都尔汗,而是苏蒙边界的达达勒(距苏联仅五十公里),令人费解的是,飞机不再继续往北飞行,而是在达达勒转了一个大弯,由北改为向南飞行,飞到温都尔汗坠毁。后一图引人关注的是,飞机起飞后,没有转弯向北飞行,而是沿着起飞航向向西南飞行,十四分钟后才转向西北方向,并消失在雷达以外。三篇文章提供的信息,引起研究者颇多猜测和推断,目前仍在争论。

关于林彪座机如何坠毁的,说法五花八门。最离奇的说法是,林彪所乘汽车在北京玉泉山附近被早已埋伏好的部队用火箭筒击毁。有专家在官方结论之外,概括了以下几种说法:一是“256号”三叉戟飞机飞行员潘景寅等空勤人员,在飞机上反劫机,导致飞机迫降坠毁;二是飞机被驻蒙古的苏军导弹击中,飞机受伤后,进行带火迫降时又发生事故,最后迫降失败;三是飞机被中国导弹击落;四是人为破坏。所谓“人为破坏”,有专家以蒙古国目击者的口述(先看见空中火光,再看见空中物体坠落)为依据,对照中国空军当事人提供的有关“256号”飞机油料、航线图等材料,结合有关当事人的回忆和飞行技术常识进行分析,否定了“油料耗尽说”,认为“256号”飞机是先起火后迫降的。至于起火原因,有一种可能性是该机在起飞前安放了爆炸物,造成飞机在空中起火。

上面所说,只是有关“九一三事件”研究的几个争议的问题,而且也没有展开介绍各自观点的具体内容。实际上,讨论和争议的问题远不止这些。

□ 作者简介: 韩钢,生于1958年,湖南人,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曾在党史研究室从事研究工作。现任中央党校党史研究室教授。

~~~~~

【几曾回首】

关于“重审林案”致金秋女士信

• 余 言 •

金秋女士:

我仅算一度经历和思考文革的“高阳酒徒”,不是赶今年《重审林彪罪案》之热的青年儒生。鲁豫采访令慈处理的好,人性可动心弦,陈述可入历史。令慈给我印象,如老辈讲述家事,平易感人;言谈举止通过视听传媒,也一扫往日“吴大金刚”市井流闻,回复温馨、儒雅、理解。人民是最好的评估者。斯大林作过好多错事,但在列宁葬礼时,却宣示“领袖来复去,人民却留下来了;只有人民是不朽的”——的确太好了(自然你可以说他口是心非)。

“913事件”时,我们正在农村。县、公社党员干部传达文件后,一个个竟悄然溜回家;我们几个公社的同学聚集议论,有人说某某干部回到家什么话也说不出,抱着老婆失声痛哭……学生讥笑这算什么党员,其实我们嘲笑、嬉戏政治中,自己心中也不禁苍凉落泪。那时,我们倒不是为林彪或他的部下的某个人遭遇,也不是为我们自己,而是我们的党和国家怎么办?我说,太伤人心了!一位中央财院同学说“我早就没有自尊心了”,他是老红卫兵,算站错过队的。另一个造反派头头竟然说“我们得把66年来的中央文件好好查一查,究竟出了甚么事”!应该说,青年人是客观公允的。

他们后来都官至司局级，我却走上文革思考的不归路。

我在农村油灯下读马列，研讨法国革命，从而开始扫描资产阶级革命与国际共运历史；后来读中国历史，研讨科技历史，从而理解了封建的中国史和自然科技历史。现在看来，那样仅仅是为了今后有条件，历史地认识文革，告诉后人一个真正的文革。之所以不忍对此“该死的”政治文化丢手，且看令慈讲谈有共鸣，盖因她的知识分子气质。我母亲在红安七里坪受训，她与令尊同龄；其父、舅父，都参加船山学社、新民学会活动，组织留法，熟悉润之先生……尽管我家从50年代就“退出”这个几代人向往、从事的革命，但我们，包括我，总觉得对这个党和革命有什么责任和义务。自然，我也就早你们15年领悟革命机器内里的世态炎凉。就这样，我仍义无反顾地投身毛泽东发动的文革。毕竟是毛泽东时代的人，咱们说个实话。

《重审》系列文章有个未曾正面涉及的问题，即“林系”文革派同志，在1967年夏秋的思想、行为实质，与毛、江、周的关系。王年一、何蜀手稿传我提意见时，我电问何，其他大事好说，“720”事件前后如何讲，毕竟林说了一些话，被毛、周拿住，文中未讲出；也电询王，他说“总的看林当时还是焦急毛的安全”，也未正面回答我。杨上将连篇的“回忆”，似乎突出了武汉事件后毛、林的猜忌、矛盾，而且成为90年代最权威的舆论旋律。67年军委扩大会议之后、513事件后，林对地方问题、军队支左问题的实际态度和想法，应该说清。

我心中的历史，以九大划一道，所有的老同志，统统都放回共产党里去评估认识。都是共产党嘛！毛、林、周和其他文革派领导人物，统统按当时环境，放回一个司令部；九大以后的冲突矛盾，暂供参考。那是上帝才知道的未来的事（在1969年）。当年，大家指责刘少奇有罪，后来大家又指责林彪有罪，现在，不少人又指责毛泽东有罪乃至共产党就有罪。我可能是个中间派，我看他们都是共产党，党是个搞革命的党嘛，大家都带着战争年代形成的东西。我在看文革悲剧历史时，首先想是作“无罪假设”，统统回到党内斗争里去，我不想看“原罪”，而是先“原无罪”，甚至“原无错”，回到历史环境里来考虑他们当时的主观意图、心理心态，再看客观作用。当然，作为研究，知其后，更理解之前。特别是毛、周、林这些建党建军的重头人物，我们不在他们生活的政治圈子里，一些东西不是单凭文字和传闻就可以研究和正确判断的。过去，我给朋友谈自己对文革研究的认识，我说列宁讲要革命吗，你就得是强者；现在要研究文革吗，你总得高于毛、刘、周、林。不是我们这些默默无闻无何建树的晚辈政治上可以高出多少，而是思想文化、政治文化，总得比30、40年前的老一辈要高才行吧，如果还局限在他们的文化境界里诠释和论证，可能就很难深入的了。

我做自然、科技历史研究时，首先使自己无条件地恢复到研究对象时代的自然环境条件、社会经济条件和人类技术条件去，首先做复原。自己的思维和思考也要回到当时。历史地理就讲求恢复历史的地理景观。如果在现在景观思维下看历史文献，八成要闹笑话。这样看，一些历史事件（人文与自然）的传统解析，甚至有1/3以上是偏差的乃至错的，历史几乎要重新评价。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而首先要明白是“当时”的史，再讲当代的历史哲学意义。说了这些大话，我还不算强者和研究者。小J那天谈你父亲，谈毛、林，我想还是公允和学术化的，岸然似一兄长。我也班门弄斧了，你是洋科班嘛。

1967年武汉事件和8月，是文革的一次重大转折，许多人都这样看；那天你刚走，迈克就来了，我说你在此等过他；他就这样认为。毛、周、林对文革的想法和做法都发生较大变化，顺便说，也是军委办事组诞生的客观环境之一。我以为，对于武汉事件，所有的人，至今没有真正去理解和接受历史教训，我们居然什么也没有忘记，什么也没有学会！所有的人，在此就会都失败了，可惜陈再道同志败了两次，第一次是严重失职、丢军人的脸，第二次是翻案。

72年他去福建上任时信告湖北省革委，声明自己恢复工作了，也不会翻案的，“720”时自己是真正错了。但后来趁毛、周、林死了、知情权威者皆身陷囹圄，别人义愤加怂恿，就把一切责任又推给他人，这就有违历史罗。第二次就难以让历史谅解了。（不过，1989年他反对军队进京，算是多少知道了军队搅和政治的危险，知道了文革的某个教训，在他内心深处，可能也认真反思了的，所以我认为他虽为武汉事件翻案，但也吸取了事件本身的教训，还是纯真的，头脑并不蠢呵！）。

我研读资产阶级革命下功夫，并不亚于你们专业研究生；我对波拿巴是爱、恨合一的，我在克里姆林宫墙下1812年战争的战利品——法国铜炮下驻足，深深痛惜波拿巴把大革命的最宝贵成果——革命的军队抛弃在俄罗斯茫茫雪原了，资产阶级的专制独裁者败在封建专制主义农奴制的俄国。

我们的文化革命，把革命的军队，毁在我们投身的运动了，是我们自己把自己毁了；这些，简单去分什么“拥军派”“反军派”，去批判指责谁，都肤浅了。

杨成武的回忆口述，应当认真品味，好象把一些历史真情弄乱了。而且口气越来越大，他和权延赤可以随意揣测毛泽东的心理、思考，毛、周会同意吗？

陈再道的《始末》回忆，提到好多事情，弄不清楚，请你也考虑一下：

1. 林彪蓄意整治武汉军区吗？5月以后吴法宪根据林意，先后给刘丰电话，要武空不要跟大军区跑。是林、吴两人就决定了军委对武汉军区的态度吗？有无实际证据？林对吴究竟如何布置的？吴、刘的联系实际如何，是正常上下级工作关系，或是错误，还是阴谋？吴的文革倾向仅仅听从林、叶，还是有周、文革小组的要求？陈言从何而来？是林彪、吴法宪的专案结论吗？5月分，武空对武汉局势认识基本同意大军区，也很讨厌造反派，但是空军在涉及到支左问题上，没有支派，更没有支持、纵容，以至组织一派武力去残酷地征服另一派，按当时的条件看，武汉空军的做法是正确的，是按8条和10条办的，客观上利于稳定；特别到6月武斗升级，空军的态度是十分中性的，与中央原则一致的。盛传群众常说还是大军种、野战军，林彪的人路线觉悟高些，听中央的些。有关问题，吴对中央承担了错误责任吗？目前只见市面文人议论，不知实际情况。

2. 林彪“八九”讲话，暴露了他整治武汉军区的“一贯用心”吗？为何曾、刘的任命谈话，是周恩来急调曾思玉进京，在7月30日去作的，而非林？（林当时不在北戴河吧）林、周在改组军区党委立场、态度上是一致的吗？改组大军区党委，难道可以一个林彪就决定吗？主持军委工作者能不能对某一军区首长不放心？是思想分歧还是阴谋政治？毛、周在7月6日至9日，频频开会，是否也对武汉不放心？（权延赤就认为毛怀疑陈）作为军队和文革的统帅，毛、林能不能对一个两个军队首长不放心？我们似乎不能批判毛、林，就不公正的剥夺他们的权利。毕竟还在中国嘛，他们都是建军、带军之人。10日周已经明白必去武汉；13日会议，已经不可挽回毛泽东的决定，大家也并未商议解决武汉问题的具体内容，三巨头对于武汉的基本估计，是否可能就在毛、周两人商谈里确定的？而13日宣布去武汉的人事，基本是毛周两人确定，没有林个人的意见？

三军领导去，仅仅是为毛的安全吗？带去作战部长，通常和可能是什么意义？毛、周共同南巡武汉，建国后是否绝无仅有？周对谢笑说武汉驻军是他老部下，谢竟没有想到，是否毛、周早已研究确认空15军和29师是解决武汉问题的借重力量？选定刘丰配合（毛的安全保障、解决文革运动问题），吴知道而且明白其中就里吗？吴法宪在北京留守（看守组的建立和说法，我想与军委的主要实权领导南下相关，还不至于是林彪夺权的阴谋吧），对毛、周南下，吴在北

京应当承担什么任务？应是13日会议交给他的任务，还是总理另外有安排？余立金现场指挥武空配合，是听命于吴司令，还是周、杨在武汉直接安排的？

3. 13日确定周的行程，为何总理办没有通知军区接机？是别人违反规定还是总理就决定如此？（似不属于中央文革通知）吴通知刘丰，是否纯属于中央明确的意图和空军份内的事情，也只能如此？当时专机师的调动、通知，是否都应该是军委空司出面而且对大军区的空司？周、吴商议好就这样吗？还是周并无任何表示，吴司令故意为难陈再道？吴在13日的行为，究竟有无违背组织原则的？所谓三军在汉口机场开设“指挥所”，是什么背景？是通讯联络需要？刘丰敢于根据林、吴意思，“私带电台”住到百花一号周恩来眼皮下吗？当时在一号楼里，三军同志和武汉同志，各自有各自的电台吗？杨成武统一指挥三军联络，会允许“私自”吗？这些问题是批林批刘丰时，由什么人揭露出来且有中央的结论吗？刘与武空和吴的联系，按常例能否手边有通讯工具？是违犯军规吗？在当时特殊情况下，是否周恩来要求的？李作鹏、余立金分别做海军、空军工作，是周、杨统一部署的，还是谢富治、吴自己布置的？我感到陈司令做回忆时，还在职嘛，为什么如此怀疑中央和军委的动机与作为？作为军人，这些是否常识范围？

4. 7月20日下午，总理专机在信阳空境，吴造谣欺骗总理吗？电告林办武汉实况也是阴谋吗？吴的主观动机是否空军最起码的规范操作，是保护站场、总理飞行安全，还是给陈落井下石？其实当天，大家——包括杨成武本人都把问题看的很严重，担心出现部队哗变——当时情况是：有几十车百万雄师和8201战士，冲进王家墩机场，要求迎接总理，说是8201师政委告诉的；总理医生说连跑道上都有卡车。机场指挥循规程地将实际情况急报武汉空司，武空急报北京空司，按照应急方案处理，总是在情理之中的。吴司令人粗一些，说陈要绑架总理，在那时是正常的“革命警惕性”，还是“反革命谣言”？为什么到7月27号，粟裕在军委会议上传达批判陈的问题，还说了这个问题，那不成了粟大将造谣信谣吗？不要说军用机场，就是民航也不允许如此冲击嘛。

5. 22日，吴、刘串通要武空发声明，总理知道和制止了吗？吴把情况汇报林了吗？是正常上下级工作关系，还是串通扩大事端、抵制周恩来？这是批林时刘自己交代的？还是吴承认的？审查李作鹏时，把李授意东海舰队过境海军发表声明，看成是林、李的阴谋了吗？总理批评李了吗？从军队运作意义上，这是什么性质的事？东海舰队与武汉空军在武汉问题上的态度，是否可以与当时大军区有所不同，而听从中央精神？是否在汉的中央与军委领导人有具体指示？是否是林彪远在北京遥控？按周恩来命令，15军入城以后与独立师换防，控制要害，公开保护造反派群众，制止事端发展，与空司发表声明有何关系？

6. 据说，15军44师、45师在周与军区二级部长会议总结后（18日），已经有所准备，19日已经有行动，这是林、吴就可以决定与命令的吗？按正常情况，毛、周本人就在武汉，军队向武汉的异常集结、移动，必须谁签署命令？北京的军委看守同志管得着吗？具体运作，是否总参就可以，而且总长就在现场嘛？20日，在汉三军领导都认为军队出现问题，而且有政治背景。此外，29师宣布脱离武汉军区，究竟是怎么回事，是否在当时紧急指定29师暂由空司、15军节制？在15军入城支左后，驻扎汉口高级步校7212的干部（一个个真像“黑铁塔”）说早在20日前就集结市郊准备应对事态，他们是事后夸海口吗？

7. 陈说林、江在8月8日用专机接武汉群众头头进京，接见，起草《纪要》，所谓中央首长讲话，究竟是林、江的下属中央首长（包括吴），还是主要是周总理讲的？当时听说是总理命令空军飞机接群众代表进京。

8. 毛泽东乘坐潘景寅的专机，是如杨说的他去现场临时指定的，还是余立金早前就去一

一查看落实的？大队长回答说专机是谢富治用的，可能吗？是否余乘坐该机刚回，也熟悉专机师情况，余又已经按总理指示，确定该机有任务，飞行员才不理解为何杨要来亲自选飞机。若按《微行》的写法，毛泽东也与林彪一样，在夜间仓促登机逃离武汉。潘扮演了两次特殊飞行驾驶角色？王进忠的回忆不同，特别在网上发表的有关回忆原稿更不同。如果11时多到上海，离开武汉是10点以前，9点半以后。组织指挥这件事，理应空军出面还是代总长？

杨的回忆录与陈的回忆自辩，对毛泽东、周恩来和林彪作古之人都不够尊重的，不象一位上将留下的信史，却有点像中学生或年轻军人吹嘘军事、历史与自己功劳那样的感觉。陈再道同志受了批斗，委屈了几年，有情绪与怨言，我十分体谅，不过应该尊重历史；以上一些问题，可能出自他个人恩怨，所以我没有明白历史究竟是不是那样，应该如何看？反正今天不需要追究谁的个人责任了。

当然，7月26日的常委会上，令尊打陈耳光、骂娘，什么时候看都不应该，在我们文人看来实不应该；但当时一切也还是可以理解的，老将军圈子里不都有些爱骂娘，轻则动手吗，好些将军的粗鲁与骂造反派，你看那些记载传言，性格其实也十分可爱，我现在看到可以笑出眼泪。都是行伍出身，那能那么文儒，像你母亲那样文雅态度的人可能少些。吴法宪还不算厚重少文的军人。当时大家还是出于陈再道竟敢造毛主席的反有一种义愤，多数人真是愤怒的。就像“913”后大家对刺杀毛主席有义愤一样，你父母应该能理解的。党内斗争，搞暗杀总不是正常办法和合法政治（不谈民主政治）。问这些问题，首先把你作为学者，而非吴的闺女。如小J所说，学者要对社会、历史负责。

以上涉及到三军、令尊的历史，望能在你的研究里关注，提出你收集的资料和自己看法；当然是作为学者，而非亲子。军队和武汉问题，我希望大家能多多提出讨论，以正历史视听，希望证实一些历史事实。谢谢。

研 祺 ！

余 言 2004-10-01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丁凯文（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